

臺灣社會學刊 第28期(增刊)
2002年9月 頁153-200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28 (supplement), September 2002

一般論文

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到消費的文化經濟學： 從階級做爲施爲機制的角度來考察

葉啓政*

* 葉啓政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收稿日期 2002 / 3 / 12 · 接受刊登 2002 / 8 / 1

中文摘要

傳統西方社會學一向以強調生產面向的政治經濟學做爲論述社會的基架，但是，晚近來，以消費爲軸線所開展的文化經濟學論述，卻似乎有逐漸凌駕而成爲主流論述的趨勢。情形所以會是如此，可以同時從西方社會發展史和社會學史中找到一些足資依循的脈絡。在這些可依循的歷史脈絡中，作者選擇了十七世紀時即出現在西歐社會裡之「舒適」概念的歷史背景做爲討論的起點。繼而，透過以「階級」做爲施爲機制這樣的論述基礎，討論整個現代社會如何從以資產階級做爲歷史主體，轉而以居中產位置之新階級做爲歷史演進的領航者。於此，討論的焦點擺在說明新階級所具之「矛盾階級關係中的矛盾位置」的特質，是削弱了過去（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強調而體現在生產面向（又特別是階級對立）之結構命定格局的重要「潛在」條件。基本上，情形是，在新階級逐漸搶得了歷史主導權之後，這樣的「矛盾階級關係中的矛盾位置」特質，對塑造以「舒適」心理爲基礎之消費行爲做爲軸線的歷史場景，產生了迂迴促發作用的可能性。這樣可能來臨的社會場景基本上內涵著，過去生產面向爲焦點所呈現的生與死撕裂對抗格局被衝散掉了。此時，人們把「死亡」予以懸擱，人類文明朝向一種無止境、也無責任負擔之「永生」的「自由」狀態發展。

關鍵詞：生產的政治經濟學、消費的文化經濟學、新階級、矛盾階級關係中的矛盾位置、舒適

一、前言

把人類的經濟活動區分成生產、交易、分配和消費四個面向來看待，一向就是現代西方社會學家分析和理解經濟現象時典型的作法。首先，這顯示的是，雖然經濟活動經常是落實在個人身上，但卻不是純屬個人，而是發生於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社會互動現象。其次，這樣的社會互動涉及的，基本上是有關如何透過勞動的形式來運用種種（自然與社會）資源，以滿足人類做為存有體、並得以繼續生存的種種現象。既然關涉的是運用種種資源，而且，人又是一種懂得使用工具的動物，因此，如何透過工具的使用以進行資源的開發與運用（也就是所謂的「生產」，production），自然就成為社會學家們考慮的基本議題了。同時，既然勞動生產是發生在人際間的一種互動現象，對生產品的分配方式與生產工具的所有權歸屬（特別是財產權），順理成章地成為重要的問題，而且更是不能不予以特別關心的倫理性課題。¹在這樣的前提下，凸顯勞動生產的面向來進行有關「社會」之現象與互動形式的討論，自然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而且，特別是擺在以科技為基礎之工業資本主義開始發達的歷史場景裡，從生產面向來考察社會現象，更是具有著厚重而深遠的歷史意涵。說來，或許，這正可以用來說明Marx從階級的立場來討論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以及Weber（1958）討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關係，所以在西方社會學論述裡一直被奉為典範

¹ 這樣的說法其實是相當粗暴，因為這涉及到的基本上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作用下的特殊情形，本質上並不是普遍的現象。顯然的，這個特殊的情形是發生在西歐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發展以後）的一種歷史現象。只是，既然我們討論的是關於源自西方近代文明的社會現象，所以，以這樣的角度來切題，應當是正當的，而且也具有著Weber特別強調的意義妥貼性的。

的關鍵所在吧！

然而，在我的觀念裡，如何謀求自我維生（self-preservation），乃是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狀態，而消費「東西」（如食物）則是人得以維持生存的最基本要件。就此立場，生產做為人與自然產生接觸之社會介體機制的一種歷史形式，它基本上只是具備著「手段」的性質。²相對的，消費著人們所生產的「東西」，毋寧地才是一個人最具初基性或有意無意被誘導出來而接受的「目的」，儘管相對著其他具社會指標性質的概念範疇（如社會聲望、身份與地位），它的社會意義可能被移位，而成為只是一種具手段性質的表徵方式。譬如，一個人買了一輛朋馳的汽車，往往並不只是單純用來代步而已，而是用來展現財富與身份地位。說來，這恰恰又是生活於日益富裕之社會裡一種極常見、且「普遍」為社會學家所關注的現象。³其次，我特別要在此處提到的是，貫穿整個經濟活動過程來看，生產、交易、分配和消費四個面向，在時間序列上理當是相互扣聯而連貫在一起的，按理，四者應當等重，不應有所偏

² 當然，假如我們接受有著所謂「社會」這樣的「東西」外於個體而自存的話，對「社會」而言，「生產」就不一定只是「手段」，而極可能是成為「目的」的本身。再說，若把個體擺在必然「社會化」的脈絡下來看，「生產」面向可以轉而成為一個人得以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社會性」目的。在此，我所以做如此近乎哲學人類學式的假設性說法，目的是用來凸顯、也是呼應著「消費做為思考當代社會現象之主軸」的經驗可能性，尤其是所開展的特殊時代意義。

³ 在此，我無意把自己捲入那複雜、惱人、且往往難以有解的「手段—目的」分殊問題。在此，我做這樣的設定有一個用意，乃是希望藉此做為基礎，以來凸顯生存於後現代社會場景中之人們傾向於以消費「情緒」為主調的生命觀與其所鋪陳的社會理路。因此，基本上，對人之存在做這樣的設定，乃是用來呼應已漸浮現、且有潛力成為優勢主流的社會結構理路。有關所謂後情緒社會（postemotional society）的討論，則請參看 Mestrovic（1997）。

廢的。然而，在前述的前提下，特別是回顧實際體現在西方社會學論述當中的，它們卻是受到不同程度的關愛。很明顯的，其所以如此，乃是因為論述產生時的時代背景不同，而整個社會的結構基調也因時因地有所改變的緣故吧！對此，我個人實無能力做更進一步的釐清，我在此所能做的僅僅是，就整個西方社會學論述的趨勢發展情形來做一點權宜性的區分，為的是方便底下的討論得以有個依據，雖說這個依據看起來是「武斷」，但卻可以具有著一些社會學發展史上的意義。

大體上，若以1970年代中葉做為一個權宜的分段點，那麼，之前，以生產為主軸的論述一直是位居主流地位；之後，以消費為重點的論述則日益浮現，發展至今，且蔚成論述經濟社會現象時不可或缺的一環，並且，甚至有搶奪到整個論述主導權的勢態。⁴情形若是如此的話，我

⁴ 這樣的分段當然是相當武斷，可以爭議的。其實，有關從消費的角度來進行社會現象的討論，至少應當可推到19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Horkheimer與Adorno (1972) 的作品〈文化工業〉(The culture industry) 與Benjamin (1969) 在1936年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一文。如今所以選擇1970年代中葉做為分段點，主要是因為以消費為論述取向之重要思想家Baudrillard的思想轉折代表作《生產之鏡》(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的法文原版發表於1973年。在這份作品中，Baudrillard (1975) 正式告別Marx以生產為主軸的論述架構。就社會學之論述典範的轉移而言，尤其，針對以消費為重點之新時代的來臨，無疑的，Baudrillard這份作品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開啓了1980年代以後有關消費(文化)現象之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序幕(參看Featherstone 1991, 特別是序言; Warde 1990, 1992; Burrows & Marsh 1992; Agnew 1993; Campbell 1993, 1995; Appleby 1993)。在此，必需強調的是，這樣的說法並不等於意味著所謂的消費社會始於1970年代，而頂多只是指陳著一個說法：西方社會學家對消費現象予以嚴肅而明顯的思考與關注，大約是在於1970年代裡開始較為顯著地看到。當然，即使情形是如此的話，並不等於宣告生產面向不重要，也不值得我們賦予注意。其實，就理論建構的層次來看，即使是所謂消費社會來臨了，生產面向的社會

們可以進一步地追問許多的問題，而其中涉及促成這樣一個現象浮現之「可能的『客觀』社會機制到底為何」這樣一個問題，應當可以說是一個有趣、也同時深具理論和實際歷史意義的關鍵性課題吧！對此，我選擇了「階級」（而實際上是特別指涉到所謂的「中產階級」，尤其「新階級」）做為關鍵的「客觀」施為機制（agency mechanism）來進行闡述，而這正是下文中所要討論的主旨。至於其他的相關議題當然是重要，但是，為了使得討論的焦點單純化，只好割捨了。再說，或許讀者會進一步地追問：「那麼，你何以獨惠這樣的一個問題呢？」我想，對此，必需有所交代，縱然只是相當簡單地提出一個理由而已。這個理由是：打從「生產」面向做為社會學關心的焦點課題以來，「階級」就是最為受到重視的概念。因此，從此角度來切題，可以產生「解鈴還得有賴繫鈴人」之對迴性對話的作用，而且似乎也具有著更為特殊的歷史意涵。⁵有鑑於此，底下，讓我還是從「生產」的面向說起。

學意義依然是存在，而且不能降低注意力的。一方面，由於這並不是本文所欲討論的重點，而另一方面，這也非我個人之學力與知識素養所逮，所以也就不再多加闡述了。

⁵ 很明顯的，這兒所提出的理由不會是唯一，更不應宣稱是最為重要的。當然，人們可以舉出更多、更重要的可能理由，但是，這不是本文所欲表達的，所以，也就不多加以說明了。其實，作者並沒有建構大理論的大野心，在此想做的，只是企圖為「中產階級」（特別是「新階級」）這樣一個社會範疇在當代社會場景裡的位置做個「適當」的定位，如此而已。尤其，針對諸多西方社會學者（參看註3所引之文獻）強調消費文化現象的研究，以及對中產階級在消費現象中之位置的討論，作者更加感到有對這個議題表示一點個人意見的必要，而且必需把整個討論鎖定在「階級做為一個社會機制」的概念上面。有鑑於此，在這篇論文裡，也就不再觸及其他更具理論深層意義的課題，儘管這些議題或許是相當的重要。

二、何以是「經濟的」： 自然／勞動／生產三位一體之世界觀的形成

直到十九世紀初期，西歐人對「自然」一概念的理解，還不是以時間做為要素。Engels 即曾指出，當時，「自然根本未被視為會在歷史上發展的東西，根本未被視為有歷史的東西；大家都只考慮到它在空間中的延伸；……自然的歷史，正如行星的橢圓軌道那樣在一切時期都一樣有效」（間接引自 Baumer 1988:406；或參考 Engels 1960:185-186）。相對於此一思想傳統，Darwin 透過強調適者生存之競爭演化論的說法，把時間因素引進自然的觀念之中，這無疑地「歷史化」了「自然」，並賦予它一個新的（即時間）向度。尤有進之的是，跟隨著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具有演化性之源起關係的主張普遍被承認，人類的概念於是也必需納入「自然」的秩序觀當中，並且予於適當的安頓。

在此，必需進一步指出的是，在 Darwin 的演化觀念裡，人類是野蠻人的後裔，是求生鬥爭下的偶然產物，有著無法磨滅的低賤起源烙記。Darwin 的「總代理」Huxley 也一樣的，⁶假定人類也是宇宙歷程的一部份，乃從原始的黏質物演化出來；或者以更嚴格方式來說，他們是野獸的後代。然而，儘管人類是野獸的子孫，這卻不等於命定人類是他們中的一個。毋寧的，人的榮耀乃在於他現在體現的狀況，而不是他所源來之卑微祖先的樣態。準此立場，Huxley 認為，因為人類懂得使用理性與語言，也發展出一套道德意識，他必需、也因而能夠與宇宙歷程搏鬥，並且上升而居處其上（以上引自 Baumer 1988:412-413）。

準此論述的立場，於是乎，人類可以說是屬於大「自然」（Nature）

⁶ 這是 Darwin 本人對 Huxley 的稱呼（引自 Baumer 1988:402）。

(特別用粗體字的方式來表示)的一部份，而於其中，除了人類之外，尚包含種種無生命物質、植物與其他動物等等，我們何妨以一向人們慣用的(細體字)「自然」一詞來總稱此等「東西」。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推演地說：基於人類所具有的種種天賦特質(譬如具有理智思考與運用工具的能力、必需攝食才能生存等等)，利用厚生是極其自然不過的事。特別，當我們把人類視為萬物之靈，同時也視生存競爭是自然法則時，人類利用厚生來謀取生存與經營生命，更加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了。

人類如何利用厚生呢？在現代西方社會思想當中，有關這個現象如何在不同的階段具體地體現在人類社會裡，Marx 的論述可以說是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也最富批判色彩。特別，其論述乃直接衝著有替資產階級護航之嫌疑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如Ricardo)而來，因此，在今天這樣一個資本主義旗幟大張的時代裡，根據他的看法來予以說明、並引申，對回顧整個中產階級的發展，尤其，其對塑造消費導向之社會形態的潛在功能性「助益」，更是有著特殊的歷史意涵。⁷簡單說，在Marx

⁷ 爲了對應著本文所關注的論述焦點(即中產階級對消費導向社會形塑的特殊意義)，底下在討論Marx的論述時，不免在概念做了一些特定的選擇，也進行了一些特定的安排，這是首先需要加以說明的。再者，由於本文所設定的目的並不是在於對這些援引的概念進行社會思想史的仔細排比論述以來淬鍊一個完整的大理論，底下諸多有關理論性的說明(特別涉及到所謂之哲學人類學的預設)，其實只是單純地用來支撐說明「階級」做爲一種社會機制，它如何有助於消費導向之社會形態的形成，所以，整個論說就不得不以相當簡扼、甚至是理路跳躍的「肯斷」方式來鋪陳。如此一來，其中疏漏、未及說明清楚、特別是曖昧模糊、乃至無法完全貼切論述之元神的地方，也就在所難免了。做這樣的說明不是企圖爲自己的「不是」脫罪，而是把個人在寫作時所面臨的限制困境說出來，畢竟，文責還是要自己負責的。

(1964) 的眼中，基本上，人乃透過勞動與自然建立起首要的關係。其所以如此，自然是源於人類所具有的基本生理結構特徵的。首先，人必需攝食才能生存，而大自然正是提供其生存所必需之資源（包含水、空氣與食物等等）的根本來源。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誠如上面剛提到的，人類是一種懂得利用智力來創造技術、並善於使用工具以對大自然進行操控的動物。就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來說，這是「經濟的」，而且，正是勞動所以在人類的身上產生、也是所以必要的基本社會心理要件。職是之故，既然人類首先必需透過勞動的形式，才與自然建立起關係，而且，在絕大部份的狀況之下，這又都是以工具的使用做為媒介，因此，人與自然（進而，人與人）的關係，就被認為必需透過以勞動形式為本的生產面向來予以呈現，才能夠把人的歷史特質彰顯出來（Marx 1964）。⁸長期下來，當討論的議題涉及人類的經濟社會活動、而特別指涉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此一馬克思式的命題，乃為諸多近代西方社會學家思想引以為參考或分離基點。⁹

然而，我們不難發現，人類所以透過使用工具的勞動形式來干預並轉化自然的原始狀態，其目的無非是滿足人類所具諸多之需求或需要的慾望，¹⁰並進而擴展這些慾望所可能衍生之社會性的有效範疇。顯然

⁸ 簡單來說，透過這樣的過程，類似 Lévi-Strauss (1963) 所說之文化與自然（在此，或謂社會與自然）的區隔才得以可能，而且，擺回人類文明（特別資本主義）發展史當中來看，也正是這樣的區隔彰顯出生產面向的重要性，當然，更是證成了人做為一個具主動能耐之主體的存在意義。

⁹ 當 Weber (1958) 討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歷史因果親近性時，其所指涉而強調的，其實亦是在於此一生產的面向。

¹⁰ 假若使用英文字彙來表達，需求即 need，指涉的是人類基於其所具特有之生理結構而引發具本能性的激覺狀態 (arousal state)，其特徵是有著「缺乏」的感覺，譬如，口渴，必需補充水份，於是有著喝水的慾望 (desire)。需求之外，另有需

的，倘若以這樣的基本心理要求做爲一種哲學人類學的預設要件來看待的話，根據上面所陳述以個體之自我維生爲基本立場的角度來看，這可用以證成「消費現象乃個人從事整個經濟活動的終點」這樣的期待性說法。情形是如此的話，我們於是就不免要追問：當西方社會學家們在討論人類與自然之關係所以建立的社會本質時，何以在一開始就偏廢消費面向，而把整個論述的中心定位在經濟社會活動過程的起始點——生產面向上面呢？難道只是因爲在時間序列上生產乃是整個經濟活動過程的起始點的緣故嗎？或者，換個角度來說，以生產面向來定位整個經濟活動，到底具有怎樣的特殊歷史意涵？這是我們不能不探究的問題。

三、生產面向被焦點化之倫理規範性¹¹的論說基礎： 資產階級做爲社會主體的歷史場景

就歷史的角度來看，當資產階級（bourgeois）成爲歷史主角之後，

要（want）一概念，它指涉的是，激覺狀態所以引起，並不是單純地來自生理特徵所引發的本能，而是來自後天學習、且具社會性意義的慾望。譬如，一個人想喝可口可樂，並不是因爲缺乏水分的口渴，而是認爲它好喝，並且代表一種身分，也是一種生活品味的象徵。此時，其特徵就不是在於「缺乏」的感覺，而是「錦上添花」般的添加性表現。因此，慾望一詞指涉的是，人處於一種激覺狀態之中，而需求和需要則是分別說明慾望所以引發之不同性質的來源。所以做這樣的觀念轉折，基本上是因爲認爲所謂之持具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或Bellah等人（1985）所說之功利個人主義（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與表現個人主義（expressive individualism）成爲當前資本主義（特別美國）社會的主導動力。在此狀況之下，回到個體的「慾望」概念做爲出發點來考察社會現象（特別消費現象）應當有著一定的歷史性意涵。有關此一立論的理路，可以參考Xenos（1989）從思想史的角度來釐清「需求」轉折到「慾望」的討論。

¹¹ 所以使用這樣的用語，乃因爲Marx的理論是我們將用來論證的重點，而一向

以生產為主軸的社會勞動被推到一個特定的理性表現形式上面。從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來說，這當然是反映著當時之資產階級所內涵的基本「理性」意識屬性。¹²換句話說，在資產階級做為歷史舞台上的第一主角的場景裡，人之所以為人、也所以展現其所具的理性特質，乃因他（她）具有勞動的潛在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會以具體的形式來展現。更具體地說，使用技術與工具的勞動形式，乃人特有之理性特質的一種實作形式，而就制度的角度來看，以私有財產制為本的「生產」形式，則是這種勞動的社會實作最具體而微的歷史表現方式。

Marx的理論被自認具價值中立、且客觀性的實證主義者稱為規範性的理論。在此，所以套用之，實有揶揄與諷刺的意味。比較中性的用語或許應當是「具倫理意涵的實踐理論」這樣的說法。

¹² 在十七世紀裡，法國的資產階級即學會開發人類的理性資源，醉心於邏輯推理，並習慣於運用智力而得的數據來處理自己的行為和思想（參看Pernoud 1991b:231-263; 1991c:90-91）。譬如，在當時的法國，無論市政府官員或企業家都日益強調統計數據，即是一個明例（同時參看Desrosieres 1998; Gigerenzer et al. 1989）。Pernoud即指出，Descartes本身即是出自資產階級的哲學家，他賦予法國資產階級進行理性思考與實作的哲學基礎（Pernoud 1991c:90-91）。Hobsbawm（1997:342-343）也指出，直到1789年，對啟蒙之進步意識最有利與最前進的表達方式，當推古典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所持有的嚴格理性思想。這個理性思想同時也是世俗的；也就是說，在原則上它確信人類有能力用理性來理解所有事物，並解決一切的問題。Koselleck（1988:10-11）即稱這樣一個由資產階級所帶動的理性主義為資產階級的歷史烏托邦觀。顯然的，誠如Cassirer（1996:11）所說的，假如國家／社會的區分對張是啟蒙思想的一個領域的話，對代表著「社會」（以Habermas〔1989〕的說法，此實即市民社會，也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資產階級而言，其所持有的理性本質上不是被看成為知識、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被視為一種具工具意涵的能力或力量。基本上，這種能力和力量只有通過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準此，依附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以肯定私有財產制為本的勞動生產，於是乎，實際上只是一種特定的理性呈現形式而已。

針對具如此之理性意義的勞動生產的社會內涵，Marx 的批判性見解，無疑地是極具代表性，而且，在思想上，甚至與其所反對之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是有著一定的接續性的。¹³ 準此具接續性的角度來看，其所彰顯的歷史意義和地位，自然更加是不容忽視的。因此，在此，爲了對映著如 Baudrillard (1975, 1981) 所提出之「象徵交換」(symbolic exchange) 在當代社會裡所彰顯的特殊意義，讓我們特別凸顯使用價值 (use value) 一概念在 Marx 之理論裡的意涵。簡言之，無論就現實實作或理論論述的立場來看，針對著人類的勞動生產，Marx 乃相當程度地分享著古典政治經濟學所強調之「效用」(utility) 的意義。換句話說，對人類的基本身心需求結構而言，「物」的使用價值是「不可比較的」(incomparable)，而且更是「自然的」(natural)。勞動爲的是，正是透過物的生產，讓自然對人所可能具有的這樣使用價值得以充分呈現和貫徹。因而，人們對生產之「物」的使用價值是否得以有充分證成的機會，可以看成是滿足人做爲「人類」這樣之種類存有 (species beings) 的基本生理與心理需求的第一要義，而這也是「人道關懷」的最根本基石。¹⁴

¹³ 譬如，Seidman 即認爲，Marx 乃以革命的方式來處理、並超越自由主義的限制。同時，對現代文明，Marx 與自由主義者其實分享著正面的態度。基本上，Marx 對自由主義的理性與倫理核心還是予以肯定的，因而，共產主義甚至可以看成是對自由主義之原則的一種實現和轉形 (Seidman 1983:12, 71-72)。

¹⁴ 我深知這樣的論說是過度簡化了 Marx 討論「使用價值」此一概念時豐富的理論意涵。事實上，特別是擺在實施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在討論這個概念時，是不能偏廢諸如 (抽象) 社會勞動、生產過程、和 (特別) 交換價值而孤立起來看待的。在此，所以未進行更細緻的闡述，那是因爲這並非本文所欲討論的重點，而且，篇幅也不允許做更多的討論。對我來說，影響我從這樣的角度來切題的是始於 Baudrillard 對使用價值概念的批評 (參看 Baudrillard 1975, 1981：特別是頁 130-

既然以使用工具的勞動形式來進行生產，乃是確立人類與自然之間所具理性行動關係的初基結構性特質，把具「效用」意義之使用價值供奉成爲滿足（甚至是經營）需求之最根本的價值，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這樣的思想基本上是肯定人所具的生物特質是塑造人做爲一種社會存有體之圖像的基本要件。¹⁵準此，一旦對人類的世界寄予強調平等、自由、自主與正義等等理念之人道主義的關懷時，把人存在的基礎予以「生物化」這樣的基本立場，很自然地就成爲極具倫理意涵的基本要求了。¹⁶

爲了充分地說明生產面向所以一開始就成爲西方社會（經濟）思想的焦點，在此，讓我們再用一些篇幅來做進一步的討論。首先，必需指出的是，容或勞動是人類所共同具有的一種普遍現象，生產關係的樣態是怎麼個樣子，其實總是隨著特定歷史條件的變異而有所不同、也可以有所更易的。否則，Marx對具市場導向、且尊重私有財產制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形式予以嚴厲譴責，就不會有意義了。而且，他希望以共

142)。這也就是說，對Marx之理論的理解做這樣的移軸，是基於當代的一些重要社會學論述在基本典範上有所轉移的緣故，而這樣的轉移又恰恰具有著特殊的時代意義（如象徵消費現象的大量浮現帶動出有關「社會價值」的問題）。

¹⁵ 有關Marx對此一立場的討論，參考Plamenatz（1975）。

¹⁶ 把這樣的立場施及於Marx的論述上面，無疑地是有過於簡化的嫌疑。不過，在此，我要強調的是，即使把這樣一個命題用在Marx的論述上面，其所意指的只是：它乃成爲隱藏於其理論背後的基本預設命題，Marx所實際論述的是在此前提預設下所衍生更貼近「現實經驗」面向的問題，如生產力或生產過程所實際帶出來、且體現在勞資雙方的互動關係上的問題。這樣的情形也一樣地表現在Marx對「需求」一概念的認知安頓上面。表面看起來，「需求」並不是Marx的論述重點，但是，事實上，卻是其理論所不可或缺的基本預設性內涵（參看Plamenatz 1975: 特別第二、三章）。

產主義之生產關係的形式來取代，更是不可能在歷史進程中獲得那麼多人的共鳴與支持的。有了這樣的瞭解之後，很明顯的，我們就不能不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關照共產體制這個 Marx 認為具備著「不異化」的歷史形式，而探討它所以可能被證成（或被扼殺）的社會性要件了。況且，以當前整個世界圖像的基本樣態來看，既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基模是當前施及範圍最為深遠而廣泛的優勢體制形式，我們也就更加有理由把整個討論的焦點針對著它，並嚴肅地予以正視。

當我們以啓蒙的人本人文精神立場來審視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時，根據古典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它所呈現的是充滿著剝削與宰制的「罪惡」，表現出「人被異化」的現象。他們認為，異化使得「人性」嚴重地被扭曲，而「罪惡」的「事實」根源，則正出自於生產關係形式所具的基本性質上面。其中，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在，可以說是「罪惡」最最根本的源頭（Marx 1964）。¹⁷就歷史辯證的角度來看，如此把私有財產制的存在與運作當成為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質，確實掌握了一定的歷史意義。這不僅在理論上緊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質，而且，從西歐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也的確牢握了資產階級所被賦予的歷史性格與社會意涵（參看 Pernoud 1991a, 1991b）。

¹⁷ 把這樣的立場施及於 Marx 的論述上面，無疑地是有過於簡化的嫌疑。不過，在此，我要強調的是，即使把這樣一個命題用在 Marx 的論述上面，其所意指的只是，它乃成為隱藏於其理論背後的基本預設命題，Marx 所實際論述的是在此前提預設下所衍生更貼近「現實經驗」面向的問題，如生產力或生產過程所實際帶出來、且體現在勞資雙方的互動關係上的問題。這樣的情形也一樣地表現在 Marx 對「需求」一概念的認知安頓上面。表面看起來，「需求」並不是 Marx 的論述重點，但是，事實上，卻是其理論所不可或缺的基本預設性內涵（參看 Plamenatz 1975: 特別第二、三章）。

在這兒，姑且讓我們把罪惡與否的價值判斷問題暫時擺開不談，這樣一個命題似乎可以轉換成爲另外的說法來表達，那是：就人類做爲一種的種類存有體而言，假如慾望的存在與滿足是其所具基本且不可化約的生理——心理特徵的話，那麼，私有財產制的存在，則是人們一向用來證成此一實體性特徵所設計出來之一種具歷史意義的社會體制形式。於是，至少在理論論述上，我們可以說，在一定的歷史條件支撐下（例如資本主義即是當前現行具制度性的歷史形式），私有財產制的存在，乃與人們對人之生理—心理特徵的哲學人類學存有預設，產生一定的呼應關係。換句話說，肯定人之慾望的存在（尤其「儘量滿足人的慾望」這樣的說法）在論述上取得了正當性後，相繼的，資產階級則假捍衛全體人類福祉之名（但依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則只是依附在遂行特定階級利益的動機之下），用私有財產制做爲一種制度性的機制，以確保其慾望可以得到最大開發和滿足的機會。特別是1980年代共產世界逐漸解體之後的當代場景裡，某個程度的，這樣之意識形態的元神更加是被強化了。¹⁸只是，它換個面貌來揮舞著招魂旗，一方面，使得Marx的資本主義「原罪說」喪失了顛覆資本主義的能動力；另一方面，甚至反過來強化了原先資產階級視其自身爲貫徹自由主義信念之歷史使命的擔綱者角色，也藉此更加鞏固了長期以來資產階級有意或無意地以資本主義做爲歷史演進之最終形式的野心。¹⁹

總之，從過去的歷史發展軌跡來看，截至目前，至少審視已展現出來的歷史「事實」，資產階級是得到了他們想要的，而且，甚至把他們

¹⁸ 在此指的是1980年代舊蘇維埃聯邦、波蘭與東歐共產體制的崩潰以及中國共產黨以所謂之「市場導向的社會主義」爲口號而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

¹⁹ 難怪福山（Fukuyama 1993）會提出歷史將終結於自由主義這樣的見解。

所想要的一直往前推進著。雖然，回應著十九世紀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所呈現之無產階級悲慘的際遇，馬克思主義者夢想以共產社會做為對資產社會進行否定辯證之下一個歷史階段的理想社會形式，是有一定的歷史意涵，而且，這也同時彰顯出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並從生產面向來考察資本主義社會，更是有著時代性的意義。然而，這一切似乎隨著諸如資本主義之社會生產形式、種種科學技術發展等等的轉型發展，而使得整個場景起了變化。說來，這是使得中產階級的主導地位看起來日益提升，而消費面向顯得重要與所謂之文化經濟學「抬頭」的基本背景。

當然，理論上，這一切尚不足以立刻用來論斷「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之未來發展的必然命運結局，但是，卻至少說明了資本社會的體系結構相當程度地是產生了綿密而細緻的自我防衛能力。這樣的體系結構所以如此綿密而細緻，無疑地是有著一個重要的因素從中產生了作用。簡單說，這個因素是，做為保證自由之基本內涵的一種社會制度機制，私有財產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一直居有著強韌而穩固的正當地位。特別是，繼之，搭配著以「有」為終極基礎之哲學人類學的存有觀做為後盾，這又進一步地予以強化了。²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體系結構邏輯所編織起來的網絡綿密而細緻，於是自可期待。更重要的是，整個資本主義的文明發展至今，諸多社會結構性的變遷又是變本加厲，這更是有著極為有利的條件促使「消費」被當做為證成自由的基本指標。正是這個內涵的轉折更進一步地撐張了私有財產制的制度，茁壯了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體質，也強化了它的社會結構所內涵的動力，而這些都是在下文準備討論的重點。

²⁰ 有關西方社會思想中這樣之「有」的社會存有論的討論，參看葉啓政（2000：527-562）。

談論到此，有一個重要的課題是不能不加以闡明的，那是：回顧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所謂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始終就是實際政治運作（也是政治學）上重要的核心課題。準此，在西方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分配做爲一種社會互動關係的表現形式，被扣回到生產的面向一齊被抬了出來，一直就是討論的重點。馬克思主義者從生產品與生產工具之歸屬問題來開展資源分配的課題，就是一個明例。若是，這不免讓我們忍不住發問：這麼一個樣子有著甚麼重要的社會學（或歷史性）意涵呢？

針對體現在生產過程中有關生產工具和生產品的歸屬（亦即所有權）問題，古典政治經濟學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正好是分殊而對立著。對擁抱古典政治經濟學立場的思想家，基本上，他們是肯定私有財產權是基本人權，甚至希望透過立論的方式來捍衛私有財產權的正當性。這樣的主張，不管其原始動機爲何，都不免有成爲資產階級的同路人，而有替「資產階級擁有生產工具和生產品之所有權」這樣的歷史場景尋找理論基礎的嫌疑。當然，也正因爲如此，馬克思主義的擁戴者總是以爲，唯有相反地站在直接從事勞動生產之無產階級的立場，才有了歷史性的立足點（Lukacs 1971:46-82）。同時，他們甚至視私有財產制爲一切「罪惡」問題的根源，應予以廢除，也才使得讓生產工具與生產品公有化的主張，取得到具歷史意涵的倫理正當性。在此，不擬細論兩者之間在倫理上的是非與曲直，這樣的指陳所企圖意指的是：不論是站在支持或反對的立場，以這樣扣聯著生產面向來確立分配現象，才把具倫理意涵的正當性課題浮現出來。尤其重要的是，分配的倫理問題更因此一直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做爲歷史主體之兩造的槓桿上搖擺，也因而致使十九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理路與共產主義的理路總是一路鬥爭下去。更重要的，也正因爲如此之生產面向的倫理問題總是無法在人們（特別是

知識份子) 之間得到基本的共識，因而，在整體經濟體制的基本結構特質沒有產生明顯的變遷之前，順著資本主義的歷史潮流所衍生的生產面向也就一直（以正面或負面的方式）被看重著。

就實際的歷史場景來說，這樣之膠著狀態體現的重點，乃被社會學者們定位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歷史關係的特質上面。回顧西方中古世紀以後的資產階級發展史，1789年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代表著資產階級搶得了歷史主導權的開始，至少形式上是如此。再說，單就經濟的角度來看，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未大幅度發展之前，若說資本主義的形式已呈現的話，主要而顯著的也只是體現在貿易與金融兩個面向而已。當時依靠工匠學徒相傳的傳統手工藝的生產形式，並不足以帶出工業（製造）資本主義的形式，更是不足以創造出足夠數目之人們所說的無產階級的。很明顯的，只有等到了以科技為生產動力的工業生產形式出現之後，（製造）資本主義的發展才得以真正成形，而整個產業結構也才起了明顯的變化（參看 Braudel 1982）。

顯然的，十九世紀以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下，機械化的工業生產形式帶來了龐大數量之工人無產階級的出現。同時，這也導使了社會裡極富與極貧的兩極化現象明顯被強化，而許許多多的人（實質上，乃以所謂的無產階級為主要對象）面臨著基本存活之自我維生的根本問題，而這更不用談到Marx所特別重視那做為「人類」之種類存有體普遍共有之自我實現與證成的人文意識與理想了。準此種種的歷史緣由，我們似乎可以下結論說：在諸多西方社會學家的眼中（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至少，從十九世紀以來，整個（歐洲的）歷史場景乃在「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兩極階級分化而對立的結構形式之下緊繃地被呈現著。在這樣的場景裡，由生產面向而孕發之分配正義的倫理問題逐漸浮現，構成為嚴肅的社會問題。因此，由此一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顯然

的，階級結構的特徵是此一問題得以存在而被形塑之最直接的現實動力。或者，用保守的態度來說，生產面向所具的（包含是否具有）倫理（也包含理論）意義，乃端看整個體現在生產面向上之階級結構的特徵而有所轉移。同時，循著這樣的歷史脈絡、並就當前的社會（特別是西方社會）而言，正是因為貼著整個生產面向而發展的階級結構特質有著極為顯著的變化，才助長了消費面向的社會學意義逐漸浮現，並且展現出凌駕生產面向的可能情形，而這正是底下要討論的重點。

四、當代社會場域中生產與消費的拉扯： 中產階級的歷史意義

本文一開始即點到，在時間序列上，生產、交易、分配和消費四個面向乃具備著相互扣聯的連貫性，原是難以偏廢的。但是，早在十八世紀末，Adam Smith在《國富論》一書的第四部份即已把消費看成是現代市場社會的中心。他認為，消費是生產的唯一終點和目的，也是生產者的利益所必需促成、並予以達致的，而這幾乎是一個完全自明的準則，是不用證明的（Smith 1937:625）。這麼一來，既然消費是生產的終點和目的，如何安頓它，相應地也就成爲必需回答的問題了。

很明顯的，倘若消費只是對極富者與極貧者這兩極的人們有顯著意義的話，那麼，對極富者，消費的意義極可能是沈溺於享用奢侈品，以展示身分與地位；而對極貧者，消費則只不過是爲了維持基本生存的一種卑微、且不得已的行止而已。當然，擺在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來看，以這樣兩極的觀點來圓成消費對社會整體所可能彰顯的意義，自然是有嫌過於簡略。同時，若以此做爲進一步理解（或乃至界定）社會現象的核心軸線，更是難以逼近實際的現實現象的。因此，我們只有期

待，當人類的社會顯現出另外一個眾人共享的「普世」哲學人類學預設命題時，消費對整體社會的特殊歷史意義才有了充分彰顯的條件。

針對這樣一個問題，在十八世紀時，英國的 Adam Smith 提出一個命題，可以說至為關鍵，值得在此特別強調、並予以討論。Adam Smith (1937:324-325) 認為，每個人都會以相同、恆定、且不間斷的方式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條件。這樣的主張所企圖反映的，基本上是一種追求做為有著「舒適」(comfort) 感之「快樂人」的普遍心理期待 (Appleby 1993:169)。就階級屬性而言，最能反映這樣的心理期待特徵的，正是所謂的中產階級。準此基礎，顯然的，在思考整體社會的運作時，只有在歷史條件成熟到足以使得這樣的心理期待成為社會裡的「主流」，消費做為具有著明顯之歷史意義的參照面向的契機，才得以圓滿完成。²¹ 簡單說，這樣的歷史條件至少有二：(1) 在社會的現實面向上，大數法則 (the law of large number) 所支撐下的「常態性」(normality) 成為支配著社會實作的理路基礎；這也就是說，以撐出「常態性」的方式來彰顯「從眾」，是支配現實社會運作的基本法則。²² (2) 就階級結構而言，所謂的中產階級開始以隱形的姿態、但卻實際地浮現在西方的歷史舞台上。²³ 基本上，依我個人主觀的意見，這樣一個主、客觀社會條件

²¹ 雖然，至少在早於這之前的歐洲社會裡，所謂奢侈性的消費現象已經可以看到，而且甚至是主導著資本主義之經濟形式的發展 (參看 Sombart 2000, Veblen 1912)。

²² 使用現代統計學的概念來表達，最簡單的形式就是，當人數夠多到可以使得一切具常態分配之特徵的假設下，「平均值±1.96 (或2) 個標準差」所代表的部份是界定「常態」的依據，也就是「社會」的化身。有關的討論，參看葉啓政 (2001)。

²³ 所以這麼說，一則，乃因為一直到十八世紀末，中產階級這個概念才正式出現在西方世界裡 (參看 Williams 1958:13-19)。二則，他們展現其社會作用力，並不像無產階級一樣，一方面有知識份子替他們撐腰地宣揚「理論」並確立其正當性，另一方面，階級處境相對明確，而沒有曖昧性。因此，就其內涵的階級曖昧特質來看

皆成熟的時候，至遲是大約1960年代以後，特別是影像媒體科技大幅發展的事了。²⁴自此，消費面向所開展經濟和文化緊密掛勾的實作理路，才逐漸被人們（特別是學者們）意識到，並且認為具有了歷史主導權而支配著社會的發展進程。

爲了讓整個問題的討論更具有歷史感，也更形明朗化，讓我們至少回顧一下十七世紀之西歐社會的一些特殊情形。在那時的西歐社會裡，特別以當時經濟發展最有成績的英國爲例，²⁵我們發現，人們還是把消費看成只是一種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而已。固然，極貧者爲了維持基本生存所必需，幾乎付出所有的代價，而這自然是一種極其不幸而悲慘的消費方式。但是，極富者沈溺奢侈的消費模式，卻也是一般人現實上難以達致，甚至在道德認知上是無法接受的。對這些一般人，毋寧

（這將在下文中討論到），中產階級一直以「隱形」的方式發揮著作用，而這作用特別具有時代意義的即在於消費的面向。

²⁴ 這樣的情形可以說首先出現在美國。當然，這樣的斷代說法是相當武斷，有待進一步的實際經驗資料與理論論述來支撐的。同時，影響所及的並不只是影像媒體科技的成熟發展，舉凡國民平均所得的增加、生產力的普遍提升、職業分工形態的複雜化與專業化、以及教育的普及等等，都是可以產生影響的因素。

²⁵ 很明顯的，本節以下特別針對十七世紀以來英國社會中之中產階級所以形成的簡扼討論，自然是無法毫無條件地概化到其他的西歐社會（如法國與德國）。這更不用說推論到二十世紀或甚至二十一世紀的非西方社會。不同社會的中產階級的塑造自有其不同而特殊的歷史條件，雖然我們有一定的理由相信英國中產階級的歷史發展情形有著一定的「普遍」意義。在此，所以拿英國之中產階級的發展史當成討論的重點，至少有一個理由，那是：它發展最早，尤其，英國自由主義的思想是主導整個現代社會發展的基本主線，因此，英國的例子具有社會學思考上的「源起」意義。總之，底下的討論最主要的用意至少是企圖指出，中產階級的歷史意義之所以彰顯，除了在人口數量上有著絕對性的優勢以外，尚需要一些社會與心理條件搭配，容或這些條件可能因社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地正是上面所說那種處於「與必需戰鬥」和「沈溺於奢侈」之間的「舒適」狀態，才是倫理上最恰當、也最吻合現實的條件（Appleby 1993:169；同時參看 Mckendrick et al. 1982; Campbell 1987, 1993）。

十八世紀初，在那本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小說《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裡，英國作家 Daniel Defoe 即曾經評論當時英國社會中低、中和高三種不同階層之人們的生活經驗。他有一段話可以用來做為例證，進一步地支撐上述有關「舒適」之心理期待的倫理定位。他說：

中道狀態……是世界中最好的狀態，最適合人類的快樂；既不會像人類之機械性部份（按指低階層的人）暴露在種種悲慘與困頓之中，經歷著勞動與折磨，而且也不會像人類的較上層部份（按指高階層的人）為其自豪、奢侈、野心和忌羨而覺得不好意思（引自 Weatherill 1993:206）。

Weatherill 根據諸多不同的資料來源，研究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之英國社會的消費行為。她即指出，到了十七世紀末期，後來所謂之中產階層的家戶即約佔總家戶數的一半，而至十八世紀末時，則超過了一半。假若我們接受這個數字的話，無疑的，在當時的英國，誠如 Weatherill 所說的，一些進口與新款貨品的最大消費對象，應當即是這些中產階層以及更為富有的人們（Weatherill 1993:210）。這更不用說，到了工業革命以後的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裡，情形順理成章地理應當是更加明顯的。

然而，顯而易見的，整個人類的文明世界（在此，指的當然是以歐美為主的世界）呈現由生產面向轉至消費面向為主軸、並走入所謂的

「消費主義的時代」，單憑屬於中產階級以上之人口的絕對數有顯著的成長，並無法就可以立即促成的。它的來臨，或更恰確地說，消費（或消費主義）的社會意涵要能充分發揮，還必需有更多的結構性條件來搭撐才有可能的。譬如，在十七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也就是 Adam Smith 之《國富論》出現的九十多年之前，當印度紡織品輸入英國而引起利益衝突時，雖然一些英國知識份子開始挑戰過去論述經濟成長的主流經濟思想—重商主義的貿易平衡理論，但是，在現實上，這個理論仍然是無法完全予以撼動地持續影響著。人們還是認為，根據貿易平衡理論，擴大貿易（因而增加生產）才是促進經濟成長最有利的利器（參看 Appleby 1976:500）。在這樣的認知之下，後來許多人所認為消費可能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意義，是被掩遮住的。顯然的，這是因為當時足夠推動消費的客觀社會條件還不夠成熟的緣故，而這也使得貿易平衡理論的威力延至十八世紀還一直發酵著（參看 Appleby 1976:509, 1978）。那麼，這些客觀條件是甚麼呢？

根據 Appleby (1976:512, 1978) 的研究，在整個十七世紀的英國社會裡，上階層的英國人已逐漸鬆解了一向所受到來自法人社會 (corporate society) 的緊密限制，而擁抱著自由主義的氛圍。慢慢的，個人要求免於承受既成之社會義務的權利觀念受到重視，而且也漸漸為更多的人們所接受。當自由倫理把財產與財產所有者從傳統社會的限制中解放出來之際，它同時也把某些人對另一些人擁有永恆之權威支配的傳統設準一併予以撤銷。於是，存在於社會中的所有人，被認為都是自由的，而且，每個人必需對自己的行為自行負責。在資產階級日漸主導著歷史發展軌跡的潮流下，這樣的信念由上階層傳遞出來，並轉到無產者的身上，而且，更重要的，這基本上是以經濟意義為基調來導引著。具體而微地說，那即是：他們必須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自由市場的機制來

決定；亦即，他們「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取生存所需的麵包。如此一來，自由市場經濟的體制既支撐出、也證成了Macpherson (1962) 所說之「持具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的興起。於是，人存在的重點乃在於是否擁有一些「東西」、這些東西是甚麼、以及有多少等等的相關問題。這麼一來，「持具個人主義」的初基內涵是經濟的，而這也與一向即強調「獲利可期值」(likelihood of gain) 的既有經濟理性必然要產生交集。

上面的敘述中提過，當十七世紀東印度紡織品傾銷輸入英國時，一向居主流地位的貿易平衡理論，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是在詮釋上卻還是保持住一定的權威地位，一時並沒有完全被顛覆掉的。不過，在上述之「舒適」心理期待逐漸浮現的一般情況之下，中產階級與更為富有者的消費能力（至少，消費意願）卻是早已大大提高了。於是，傳統對消費（至少，適度的消費）所塗染上的污名性跟著日益淡化。如此一來，有些人即為文，提倡以刺激國內消費做為策略來對抗東印度紡織品的傾銷輸入。在此，假若我們排除這樣之主張在經濟學上的可行性與意涵問題不談，這至少意味著，當時有些英國人即認為，透過消費的驅力，人的行為是可以改變，而這正是可以扭轉經濟困境的一個有效方法。換句話說，透過供給面的擴大來創造需求慾望，而讓這個慾望由上流階層擴及到中產階層。只是，企圖藉此一樂觀仰仗人類所具之忌羨 (envy) 與競相模倣 (emulation)²⁶ 心理來促成經濟成長的做法，卻被一些人認為將使得勞工失去控制，變得懶惰而不願意多加工作。在此，我

²⁶ 特別是美國經濟社會學家 Veblen (1912) 使用後，此一字彙廣為後來研究消費現象的社會學者所運用，並成為關鍵概念，Campbell (1987) 對此即曾有所評述。總之，此一字彙所意涵之競相模倣意思，乃內涵有忌羨的特質。在此，忌羨是一個中性的概念，沒有負載著負面評價的意思（同時參看 Bell 1976:22）。

們並不關心在經驗實證上實際真正的情形是否即是這麼一個樣子；我們所關心而要討論的毋寧是，在思想上與社會結構理路上，這樣的兩難情境如何在西歐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中被消解。因為，無論就實際的歷史發展進程或理論論述的理路內涵而言，這樣之兩難情境的消解都深具有著關鍵的意義。

顯然的，自由主義所內涵那對慾望予以正面肯定之持具個人論的基本主張，雖說與當時強調控制之「獲利可期值」的資本主義經濟理性交集著，但是，本質上卻是相左著（Appleby 1976:513）。如此兩股力量相互拉扯的歷史場景，於是在西歐世界（特指英法二國）拉開了序幕。對此，簡單說，只有等到資本主義重控制的經濟理性與自由主義重自由的持具個人思想，同時而並行地成爲人們的主要信仰（尤其是窮人）的時候，這樣相互拉扯的歷史場景才有獲得化解的機會。自此，以「自我改善」爲名義的消費，也才得以獲得正式的身分登上歷史舞台，成爲整齣戲劇的第一女主角。於是，整個歷史劇原先以生產做爲男主角所孕育出的陽剛風格，才爲消費這個女主角所散發的陰柔特質逐漸侵蝕、乃至被取代，而使得整個歷史的發展才開始朝向消費面向傾斜。²⁷說來，這正是人類文明邁入二十一世紀之歷史場景的基本風貌。就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說，就在這樣之歷史意識氛圍的主導下，中產階級於其逐漸搶得了歷史主導權後，才有了厚實的客觀條件做爲後盾，成爲彰揚消費面向之優

²⁷ 所以使用一般所謂的女性特質來形容消費現象，靈感得自於 Sombart（2000）討論中古世紀以後之歐洲社會中女性對奢侈消費之形塑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況且，事實上，在當代資本主義形式的消費領域中（特別是與時尚有關的），女性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甚至把消費看成是女性的社會特徵（參看 Ewen & Ewen 1992; Fine & Leopold 1993:68-69; Slater 1997:54-59; Firat & Dholakia 1998:17, 76）。因此，消費做爲一種社會現象，以女性慣有的表徵來形容，是具有一定的歷史意涵的。

位性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²⁸

五、導向消費為重心的推手：由中產階級而至新階級

英國社會學家 Saunders (1986:232) 指出，雖然生產對消費有著一定的決定性，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就說，對消費的分析必須依附在生產的分析之下。換句話說，兩者有相關並不等於意味著，它們依附著同一個理路，也非在功能上必然具有著一對一的符應關係。同時，誠如 Preteceille 與 Terrial (1985) 所說的，對消費的需求和喜好，不可否認的，乃與生產體系之結構自身所衍生的種種需求（如勞動力需要再更新、創造新技術等等）有著關係，但是，消費做為一種社會現象，有其自性，因而有著自我衍生、且有別於生產面向之特質的另外面向。這也就是說，對既是勞動力的消費者，自有其非勞動力（亦即非生產）的另一面，而這乃內涵在消費本身做為一種社會現象所具備的基本特質之內。譬如，上面所提到之「舒適」心理期待，尤其是由此所衍生（或更恰切地說，與之相關聯）追求風尚與營造生活品味等等的象徵符號意

²⁸ 我深知，以這樣一個發生於十七世紀起之英國社會的特殊現象，做為肯確「消費」面向取得了優位性的歷史（尤其，理論性的）證成依據，就實證的立場而言，證據是相當薄弱，並不具普遍的說服力的。我所以還是採取如此的做法，其實是基於兩個層面的認知。第一、整個論述只做為一種歷史性的例證而已。第二、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現代理性文明展現了優勢性，成為主導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向。英國可以說是發展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典範」社會。因此，其發展過程足資參考、乃至深具一定的影響作用，因為其文化優勢性會產生擴散作用的緣故。其實，所謂「現代化」成為全球性的現象，反映的正是這樣之優勢性擴散作用發酵的結果。如是，縱然是發生在近代英國的特殊歷史現象，基本上，它還是具有一定之「普遍」結構性的意義的。有關的討論，參看葉啟政（1985）。

義，都是超出單獨以生產面向所能規範的範圍的。

對人類而言，至少爲了滿足所謂的基本生理需求，是必須消費資源（特別是自然資源）的²⁹。但是，打開人類的歷史來看，即使是在所謂的初民社會裡，消費即已明顯地開展出另外一層內涵更爲深沈、更爲豐富的人類學意義。就此，誠如Bataille（1988）所指出的，這個意義乃體現在內涵著「耗盡」（expenditure）與「過多」（excess）二概念的種種人類的行止當中。簡單說，無論就個人或社會而言，生產除了應付個人或社會之有機性成長所需的消費必需之外，其餘過多的部份都得予以耗盡。就人類的文明發展歷程來說，這樣的耗盡性消費的本質是極具儀式象徵性，因而，其本質是「文化的」，而非純粹的「經濟」意義。在這中間，最爲典型的莫過於是戰爭了。而在平時，諸如建立具象徵性質的大型公共建築（如教堂、紀念堂、寺廟等）、舉行嘉年華會或誇富宴、乃至收集古董與藝術品或追求時尚等等，都是例子。³⁰準此基礎，就其特點而言，這樣表現消費的模式，基本上乃是以「物」做爲介體來展現一種帶炫耀性質、且具集體象徵意涵的行止。若借用Veblen（1912）所使用的詞彙來說，這即是「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它往往代表著一個社群之成員所共同分享的集體想像與幻想，而這恰恰正是常常被人們用來認定一個社會所具之文化特色的關鍵所在。因此，「耗盡」與「過多」成爲使得一個社會的文化特色得以呈現的基本經濟性條件。說來，人類的現代文明即正處於以這樣的炫耀性消費模式做爲

²⁹ 其實，甚麼是人類之基本生理需求的最低生存條件，本身就缺乏一個客觀的共同標準。如此一來，話說到底，這個問題所牽涉的還是社會的相對標準，因此，其本質是社會性的。

³⁰ 對以上的論述，Bataille（1988）提出相當細緻的理論性討論、而且深具影響，讀者可以逕行參考。

主軸之歷史場景的巔峰狀態當中，而依據「常態性」的立場，與此發展模式最具關係的歷史主體正是所謂的中產階級。

根據 Veblen (1912) 的意見，彰顯炫耀性消費的主體對象，最主要地乃來自所謂的有閒階級 (the leisure class)。無疑的，就中古世紀以來之歐洲社會的發展過程來看，諸如國王、領主、貴族與教士等等人物，可以說是有閒階級的源起性「族群」。再次地，依據 Veblen (1912:43) 的說法，這乃是以征服為主的古代掠奪文化 (predatory culture) 傳統所塑造出來的一種社會結構形態，其基本心性特質並不是勤勉辛勞的工作，而是顯現勇武 (prowess) 的情操 (Veblen 1912:27)。然而，發展到十九世紀的工業社會，有閒階級的結構形態明顯地改變了，它主要是來自累積財富有成者 (Veblen 1912:158)。³¹就此，資產階級 (特別是大資產階級) 是最主要的一群人，而另外一種的可能有閒階級則是被歸類為低階層的黑道犯罪者。做為新的有閒階級，這些人是繼承著過去專屬這個階級的生活方式，其中含有野蠻時代的理想與習慣，其特點是企圖保持掠奪時代的勇武精神。³²但是，事實上，在這些從平民階級脫穎而出的「暴發戶」身上，我們實際看到的，並不是具古代意義的勇武精神，而卻只是奸詐、虛偽與虛張聲色的威嚇等等的特質 (Veblen 1912:164-165)。

在此，所以援引 Veblen 對十九世紀末西方社會 (當然，他研究的對象是美國社會為主) 之有閒階級的討論，為的是希望指出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那是：整體來說，在工業生產形態儼然已成、且資產階級明顯

³¹ 同時參考 Sombart (2000)。

³² Veblen (1912:176) 即指出，譬如，這些人維持以打獵做為高尚的休閒方式，平時，出門必帶手杖，而手杖乃象徵過去身邊所攜帶的武器。在古代，這些行為 (指打獵與攜帶武器) 都是有閒階級表現勇武精神的特殊形式。

興起的早期工業社會裡，有閒階級還是專屬社會中的少數人，而尚未擴散到更多、更廣的人口。其所以如此，可能有兩個理由：一方面，在時間序列上，它與過去的世界較為接近，因而，很自然地在結構上有所延續。另一方面，工業生產的結構形態尚未擴散出去，而產生明顯而戲劇性的整體改變，因而，不但有閒階級屬於少數人口，而且其結構特質並未產生根本變化。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整個工業生產的結構形態有了顯著而大幅度擴散的變化。這個變化引起了市場導向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跟著產生了極具戲劇性的演變。簡單說，這即是中產階級在歷史舞台上的角色日益重要。到了這個時候，不但潛在具（炫耀性）消費能力的人口數目改變，而且其內涵也跟著起了質變。籠統地來說，從此，「常態性」對（炫耀性）消費現象的塑造，尤其，其所具之歷史意涵的界定，帶來了重要、積極而明顯的作用。對（消費）文化的塑造，少數「真正」的有閒階級變得不是那麼重要，反而是勤勉工作的中產階級成為塑造（炫耀性）消費現象的主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其所表現的並非在於工作場域與時間內，而是在於工作之餘的閒暇場域與時間當中，所以，此時，重要的不是有閒的「階級」本身的界定，而是諸如所有人們的有閒「時間」有多少、如何安排、以及「場域」為何和有多大等等的問題。這麼一來，整個有關消費面向之課題的重點也跟著產生了歷史性的移位，而這正是中產階級展現歷史意義的重點所在。

前面提過，在十九世紀的西方社會裡，中產階級即開始崢嶸頭角地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但是，他們要成為歷史主體，而主導著整個社會的發展軌跡，則必須有著一些結構性的條件與之搭配才有可能。對此，簡單地說，除了上面提及過之「舒適」心理期待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之外，最重要、且深具社會學意義的另外客觀歷史條件，莫過於是生產技術的

一再創新發展，尤其是導使經濟生產愈來愈仰賴知識（尤其科學知識），也愈來愈依賴資訊的靈活流動和溝通這樣的結構形態。美國社會學家 Bell（1973）稱這樣的社會為「後工業社會」，也是「知識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除了知識與訊息成為整個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外，在職業結構上最為顯著的變遷，莫過於是所謂服務行業大幅興起。尤其，在資訊、傳播與運輸等等科技（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科技，如電視與今天之網際網路的出現）迅速發展的情況之下，符號的生產與再生產（跟著即是符號的消費）成為整個產業中新興、但卻是重點的產業，而被冠以「文化產業」的稱呼。就從業人口之組成而言，這無疑地為整個社會添加了一批本質屬於中產階級的「新貴」生力軍。

總之，在進入今天這樣一個所謂「後現代」的時代裡，我們看到的是，科技（當然，特別是傳播與溝通媒體技術）、自由主義思想與市場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三者強力結盟。尤其，當社會之生產體制的結構（連帶地指涉了職業結構）產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而使得新興之文化（符號）產業的重要性愈來愈形重要之際，這類的從業人口，不但人數愈來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一些基本的社會特質，既相當不同於過去的藍領工人無產階級，也有別於過去的資產階級。這才是我們在此所要強調、也是必需強調的重點。對此，簡單說，即是：基本上，除了他們所從事的不是勞力密集，而是具知識、訊息和象徵等技術密集的工作之外，一般而言，他們受過較多、較高、也較具專業性的學校教育，而且，往往正是因為擁有這樣的學歷，才使得他們獲得到工作。準此，就階級屬性而言，他們屬於中產階級，而且是屬於所謂的「新階級」（new class）這樣一個歸類的社會範疇。³³ 繼而，倘若以馬克思主義之

³³ 在西方，新階級一詞有一段漫長而多變的歷史，可以溯及 Bakunin。當時，

「資產／無產」階級兩分的傳統社會階級觀來說，這批新階級所具的階級屬性乃呈現著「矛盾階級關係中的矛盾位置」(contradictory locations within the contradictory class relations, 簡稱CLCR)的特殊情形(Wright 1987)。因為這是一個關鍵的概念，也正是本文整個論述的重點，在此，讓我們用一些篇幅來加以闡明。

首先，根據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意見，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質即是：在生產過程中，因為生產工具與生產品的所有權歸屬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因此，資產階級（特指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特指勞工）

Bakunin不相信，在實行社會主義的社會裡，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可以塑造出新的權力形式。他以為，權力只是轉移至一群真實或偽裝的科學家或學者手上而已。新階級一詞即被使用來描述這一群實際掌權的人（參看Bruce-Briggs 1979:11）。後來，南斯拉夫的Dijlas（1967）在討論南斯拉夫共產社會的權力結構時指出，政治官僚（即所謂的「專」）和黨機器內的意識形態者（即所謂的「紅」），事實上只是希望建立一個依賴他們的經濟秩序以鞏固他們的權力基礎，而不是為了所謂「社會整體」的福祉。隨後，西方國家的社會學者借用了這個名詞，用以指涉一群因整個社會的經濟產業結構形態改變而興起的一些專業職業從業者。這些人基本上是從事與人際互動關係或（及）文化象徵有關的所謂服務行業，諸如廣告、形象營造、服裝設計、藝術經紀、心理諮商、社會福利工作等等行業（參看Bruce-Briggs 1979; Gouldner 1979; Eyerman et al. 1987; Kellner & Heubeger 1992; Savage et al. 1992; Perkin 1996）。對此，Bell（1979:186）認為，假若新階級的概念有意義的話，其意義並不在於社會（特別是職業）結構的本身上面，而是文化態度。因此，新階級不是「階級」，而是「心態」(mentality)。Bourdieu等人也建議應從「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角度來理解這群人（參看Bourdieu & Passeron 1977）。準此，不論就主觀或客觀定義的內涵來看，就其歷史趨勢而言，固然新階級往往是中產階級，但是，中產階級並不一定即是新階級。然而，在當前這樣的後現代社會裡，無疑的，以販賣符號、知識和技術為主的新階級是中產階級的重要主體。尤其，從文化象徵的角度來看，中產階級的意義如何彰顯，以新階級做為主要的指涉與表現對象，應當是可以諒解的。

的階級關係本質上是對立而矛盾著。在這樣被結構命定的關係中，固然資產階級不斷對無產階級進行著「剝削」性的宰制，但是，就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內涵的結構理路而言，這樣的「剝削」宰制關係，卻是在既定關係中他們各自之階級位置內涵而確立的基本結構特質。這也就是說，唯有如此，位置所呈現的特質（即「剝削」性的宰制）才會合乎整個資本主義體制內涵的結構理路，而不會顯得矛盾。但是，對「新階級」而言，情形並不是如此。一方面，就生產工具的掌控權而言，新階級所觸及的是諸如知識（尤其是專業科學知識）、專利技術、或創造符號的靈感（如電視廣告的象徵符號運用）等等。這自然是不同於傳統勞工面對「機器」這樣一種性質極為單純而固定之生產工具時所需的（熟練或半熟練）技巧（skill）或單純的體力勞動。正因為他們所觸及的基本上是象徵符號（尤其是專業科學知識）的創造，所以，不同於過去的勞動階層，新階級手中是握有一些特殊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而這往往是不能輕易被取代或轉移的。³⁴無疑的，諸如文化資本的介入，自然使得體現在生產過程中的原有階級關係變得更為複雜，無法維持其關係原有內涵的結構理路，而這正是整個問題的關鍵所在。換句話說，無論把新階級擺在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範疇裡來看，都無法充分地彰顯馬克思主義所認定存在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原有之矛盾階級關係中具「剝削」性之宰制的相對位置。於是，把新階級做為一個「階級」來看待的話，它無疑地是起了質變（也就是有了矛盾的情形發生）。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假如我們循著傳統「資本階級／無產階級」的

³⁴ 有關此一概念的基本定義，參看 Bourdieu (1990:124-125)。就法治體制而言，以所謂智慧財產權的法律形式介入，使得至少部份新階級在整個資本主義體制之生產過程中所居處的位置更加複雜。特別是著作權與專利權的保護，更使得（至少部份的）新階級並非完全與生產工具（或乃至生產品）的「所有權」無關。

階級二分立場來看，就其階級屬性來看，基本上，新階級或許還是比較向傳統的勞工無產階級這一邊傾斜著，而這正是 Wright 提出 CLCR 之概念的立論基礎，也是許多西方社會學者所持有的共同立場。³⁵ 本此為立論基礎來審視，我們可以發現，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固然，新階級未必如傳統勞工一般，完全喪失了控制生產工具的契機，但是，他們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關係，本質上應當還是處於矛盾對立的狀態的。因此，在「本質」上內涵著「矛盾」的階級關係中，新階級的位置，並不是如過去的勞力勞工一般，乃順著關係的結構理路而處於吻合完全被宰制之「邏輯」的「理想」狀況。相對的，其位置之性質本身所保留的（至少部份）自主性，使得整個階級關係原有的「宰制」性質被移了位，以至顯得有著矛盾，而這樣的情況就是 CLCR 所企圖意涵的。

在人類的社會裡，數字與數量一直就在刻劃社會之特徵的過程中扮演著一定的角色，而這在現代社會裡尤其是明顯（參看 Porter 1995）。準此立場，一旦新階級的人口比率數目在以職業為標竿之整個人口的常態分配曲線上成為多數（majority）時，他們呈現出「常態性」，而這無形之中即成為足以左右整個社會之優勢屬性走向的主角。因而，其所展現之 CLCR 的特殊階級屬性，自然跟著將對整體社會的演進發揮著一定的作用。這個作用到底為何？這順理成章地成為不能不關心的課題。

在此，在對此一作用做進一步闡述之前，我們必須先有一個提醒，那是：資本主義的體制發展至今，雖然具「剝削」性的階級宰制情形或許已經緩和了一些，但是，根據馬克思主義者的定義，基本上這卻還是

³⁵ 嚴格來說，以向無產階級傾斜的立場來界定新階級的階級屬性，是可以爭議的。但是，就西方工業社會的發展歷史背景而言，至少就左派的一貫立場來說，這樣的立場卻又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同情，而且似乎具有著正當性。

依然存在著，而且，甚至還會一直繼續地存在下去。只是，針對深具 CLCR 特質之多數中產階級（尤其新階級），這並未足以讓他們產生深刻而切身的「階級意識」。曖昧而模糊的「自在階級」（class-in-itself）處境，理論上，原本就很難使得中產階級（尤其新階級）孕育出具「自為階級」（class-for-itself）的集體意識。換句話說，就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階級鬥爭必然浮現的預言來說，對這些居中間的新階級，縱然生產面向仍然呈現有具壓迫性之宰制的「客觀具體」現象，但是，這卻不足以具備足夠的主觀推力來帶動具階級性的鬥爭意識。尤其，假如現實社會裡又有另外一股（特別來自消費面向）的拉力相對應地醞釀、不斷茁壯而成形，而且這又恰恰最能夠刻劃此一階級的特點時，階級鬥爭將只不過是由古典馬克思主義所謂之「自在階級」此一「紙上階級」（class on paper）概念³⁶之內涵所演繹出來的理論性命題而已。在現實世界裡，它並不必然起得了任何孕生所謂之「自為階級」的實際實踐作用的。這個時候，無疑的，整個結構形態內涵著一個理路，它將產生一股可能的動力，一方面，促使傳統以生產面向為主調的政治經濟學退位，而另一方面，則是促成以消費面向為核心的文化經濟學取而代之地起了能動作用，並扮演著驅動歷史發展的火車頭角色。³⁷

³⁶ 語出 Bourdieu，參看 Bourdieu（1998:10-113）。

³⁷ 很明顯的，當十九世紀歐洲社會進入工業資本主義的格局後，新興的工人無產階級成為歷史焦點。在這樣的場景裡，無產階級的身心狀態和社會處境自然而然地成為有識之知識份子關心的重點。特別是在於啓蒙人本之人文精神的啓迪下，無產階級的歷史處境（連帶地，貧窮問題）成為人道主義者關懷的焦點，因此，政治經濟學也就順理成章地持續著，成為整個論述的基本軸線。同時，在此需要做點說明的是，此處所謂的文化經濟學意指的是，以經濟學的立場來思考與運作整個社會的現象依舊持續地成為主流，但是，人們不再是從政治的立場來看待，而是強調著（特別是具愉悅特質之）象徵意涵的呈現，而這包含有關個人生命意義的探問。

六、由政治經濟學而文化經濟學： 展現歷史場景之軸線的可能轉折

既然中產（新）階級搶得了歷史的主導權，其所具之 CLCR 的「曖昧」階級屬性所內涵的理路，自然跟著就有著機會對整個社會產生作用。順理成章的，這自然是有助於弱化過去（特別馬克思主義者）對生產面向所附加的倫理意涵。同時，它連帶地不免促成了傳統那以生產面向為主調的政治經濟學（包含馬克思主義在內）在人們的心目中退了位，古典社會學對生產面向所開展的意義，理所當然地也就跟著產生了背離現象。在這樣的歷史背景所可能敞開的格局裡，整體來講，中產階級（特別是新階級）並沒有認同左派思想而加入傳統無產階級之革命陣營的內在必然性。因而，他們自然也就難以激發出顛覆資本主義體制的歷史使命感了。³⁸ 正相反的，他們甚至是轉過來參與了已居處既得利益地位之資產階級的陣營，強化了既有之資本主義的體制基調，而使之繼續成爲主導歷史發展的基模。尤其，在諸如社會福利與安全制度體系的

Bellah 等人（1985:295）即指出，今天美國之中產階級的問題，基本上並不是政治的，而是道德的，乃有關生命的意義。

³⁸ 儘管，Marx（1977:227）在《共產黨宣言》中曾提到，中產階級的底層者（如小商人、店東一般的退休商人、工匠與農民）終將因爲喪失了競爭能力、也因其特殊技術變得無用而慢慢地沈淪爲無產階級，但是，隨著諸如生產技術的改進、生產力的提升以及特別是整個生產分工的更加複雜、細緻與專業化，事實上帶來了更多的中產階級，是難以向無產階級靠攏的。同時，事實上，就實際的歷史經驗事實來看，無產階級也未必有著革命的念頭。況且，至少單就理論的層次而言，諸多左派學者也已明白地指出，實際帶頭擔負起對資本主義體制進行革命的主角，並不一定是無產階級本身，而往往是具小資產階級成份的知識份子。有關的討論，參看諸如 Lukacs（1971）或 Gramsci（1971）等所謂「新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

建立、各種勞工（或專業職業）組織的形成、民主政治體制的樹立、特別是生產技術的快速進步所帶來豐裕的社會榮景等等社會條件的催動，生產面向為主調之政治經濟學做為歷史動力所能引動的感應力量，無疑地是日益被削弱著。相反的，愈來愈多的人們從消費之中體驗到民主政治體制與市場經濟交錯所帶來之「自由」的成就感，也感應到消費慾望所堆砌出來之生活方式中展示了所謂「文化品味」（cultural taste）的致命吸引力，並且有了能力去實踐。³⁹

對芸芸眾生而言，在現實生活中，最基本、也是卑微、但卻可能是最常見的願望，往往只不過是期盼有著豐盛的（物質）生活水準與安定的生活環境。針對著富裕社會中的多數人，若說有進一步的情況，那也只不过是追求著文化品味以做為生活的象徵意義內涵而已。在當代社會裡，這樣的人恰恰是推及到了中產階級，並且甚至以之為主體，而再也不只是如 Sombart（2000）所說的貴族階層或富有的資產階級、或 Veblen（1912）所謂的有閒階級了。於是，消費面向的問題才是社會裡許許多多人關心的重點。整個情形正如 Bauman（1992:95）所指出的：「處在消費階段的資本主義體制，不但已不再壓制人類追求快樂的傾向，而且利用這種傾向來維護自身的存在。……對消費者來說，現實不再是快樂的敵人，貪得無厭地追求享樂不再具有災難性的後果。消費者所體驗到的現實，即是追求快樂。自由即是在較多與較少的滿足之間做出的一種選擇，而合理性則是寧願選擇前者，不是後者。對消費體制來說，隨心所欲地花錢以尋求歡樂的消費者是必須的；對於個別消費者來說，花錢是一種義務——也許是最重要的義務。」⁴⁰

³⁹ 有關消費做為自由之體現的討論，參看 Bauman（1992）。

⁴⁰ 這並不等於說由消費所證成的自由帶給人的是完美無缺的人間樂園。其實，這也蘊涵著一些新問題的產生，如更形嚴重的所謂「新貧」（now poor）問題。有關的討論，參看 Bauman（1992, 1998）。

簡單說，成就這種「義務」最重要的，莫過於是肯定了追求上面提到那講求所謂文化品味之生活方式的正當性。很明顯的，這涉及的重點不是物質本身對人類基本生理需求的滿足問題（即物的使用價值問題），而是在以物為介體經營出來之一套具特定意義的符號操控系統中，如何進行象徵交換的「品味」問題。擺在商品化的市場社會裡，這就呼應著 Baudrillard（1997:212）所說的一句名言：「要成為消費的對象，物品必須先成為符號。」於是，在資本主義以牟利為經緯的經濟理路巧妙地催動下，象徵符號一再地被創造，而且，理論上是無限衍生著（特別是透過廣告）。進而，這成為保證消費得以繼續、而且無限擴大的基本生產原則。

這麼一來，象徵交換成為整個經濟活動中至為重要、且是「真正」的內容，而自由也就在消費符號一再衍生創造中被證成。在這樣的情況下，引誘（而不壓迫）做為消費內涵的運作原則，它意味著幸福與快樂的無限可能。尤有進之的是，在符號無限衍生創造的一般狀況下，消費所開展出來的理路，已不是像由生產面向主導分配時所具的有限性，而是無限多的獨立可能性。基本上，人們可以依據其所具的主客觀條件各取所需，而可以不會必然地產生明顯的相互排擠效果（其中，最重要的條件是：只要有錢）。說來，對這樣透過經濟機制而營造出「自由」感的消費文化，中產階級正是最主要的受益者。因而，他們可能傾向於努力強化消費導向的「舒適」生命態度，自是可以預期。

無疑的，正是這樣一個強調符號消費的「舒適」社會形態明顯地浮現，足以讓我們深感覺到，在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的現實情況裡，馬克思主義做為否定辯證資本主義之歷史形式的說法，是有理由難以獲得充分的證成，至少到目前，情形是如此的。而且，這也使得我們體驗到，倘若生產面向從人們關注的歷史舞台上退位下來，應當也會是不意外的。

當然，這更是叫我們相信，體現（或至少內涵）在資本主義體制之生產面向中的所謂壓迫剝削性的宰制情形，變得更加是可以視而不見了。⁴¹在這樣情況之下，傳統的無產階級（假如還有的話）的處境被遺忘了，也變得無關緊要。他們成爲一群被社會理路消了跡的歷史「殘餘」隱形人。於是乎，整個歷史場景隱藏著產生明顯質變的可能性：消費不再只是生產做爲歷史主題下的自然衍生物；相反的，消費成爲歷史主題本身，而生產則只是爲了讓消費成爲可能的必要條件而已。

在這樣的場景裡，政治經濟學喪失了過去 Marx 筆下生鮮活跳的生命力。如今，它頂多只是以不出席的姿態潛隱地存在著，甚至可以說是被窒息住，並且在其自身的言說中被埋葬掉，而呈現出一種處於跡近死亡的「涅槃」狀態。⁴²尤其，原本，在以生產爲主調的政治經濟學中，生與死總是以緊繃對峙的方式交互鬥爭，也相互移著位。雖然，這或許使得歷史不斷呈現出諸如被撕裂、被踐踏、被蹂躪等等的感覺，但是，也正是這樣不斷與死亡進行著交換時的撕裂、踐踏與蹂躪感覺，撐出了人類要求改造的激情和強烈的求生意志，當然，更是因此同時地創造了生命的意義。

然而，如今，以消費爲主調的文化經濟學卻綁架了死亡，讓人們處於一種永恆的「生而活著」的狀態，生與死的界線被撤消了，既沒有固定的交換點，也沒有起點，更是沒有終點。再者，雖說這一切的發生其實幕後都有著一些導演（如廣告支持商與製作人等等）操縱著，但他們始終是藏鏡人，不但從不露面，而且也無從認定起。因此，縱然他們行的是「惡」，但卻始終有著不在場的證明，既不必負責，更是永遠逍遙

⁴¹ 有關的討論，參看葉啓政（1999）。

⁴² 套用 Baudrillard（1993:154）的用語。

於法外。甚至，他們還沾沾自喜地自詡是文明的創造者，是提供人們幸福與快樂的天使。他們一直有著能耐讓人們感覺到，一切都恰適地被安排在不斷流變、但卻是「舒適」的狀態之中，而且，一直在滋生與成長著。

說來，風尚與流行體系是促發消費為主調之文化經濟學綁架死亡的最基本社會機制。基本上，它們並不是以完全摧毀的方式來對待（過時的流行與風尚風格的）死亡，而是以汽化蒸發的方式，讓（舊有的）死亡迷散在新生之中。這是一種由短暫而華麗之表象以不斷接續呈現的方式來完成的永生形式。只是，在這個過程中，一片片「生」的表象接續得十分緊湊，而且，緊湊到讓那被蒸發汽化之死亡的殘餘粒子都找不到任何空隙滲透進去。

假如 Baudrillard (1993:157) 所說「死亡既不是消解 (resolution)，也非內捲 (involution)；它只是一種對反 (reversal)，也是一種象徵挑戰 (symbolic challenge)」有道理的話，那麼，一個死亡被綁架的世界，既缺乏引動亢奮激情之「生」的動力，也無法孕育對「生」全神投入的身心狀態，人們更是不必要承擔任何的責任。於是，人們找不到起源，也不需要尋找起源。一切既沒有自然本性，也沒有固定而客觀的功能關係，更是沒有定型的規則可循。這是一種充斥著奢侈與過剩的永生形式，它既溢出了任何的理性，也溢出了一切可言說與可想像的理路，當然，更是溢出了責任的範疇。責任被綁架了，留下來的，或許只是類似「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這樣一種充滿著放肆與虛脹自我的獨白。不過，這一切卻來得那麼自然，既是理所當然，而且也不必太在意。這是「自由」，或許也是「解放」，但是，卻是一個沒有固定目標的自由航程，永遠漂蕩在茫茫的大海中。

很明顯的，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一再激發消費慾望的有意「陽謀」

設計中，更多中產的新階級正慢慢讓自己走入「陷阱」之中，他們陶醉在這樣的歷史場景裡，既是「受惠者」，更是塑造的共謀者。尤有進之的是，這樣的消費刺激機制儼然已蔚成爲一種文化，也形塑成爲一種「心態」——一種「中產階級心態」，而往四面八方（特別是往年輕世代）擴散。然而，或許，在未來，他們會有了「反省」，而反過來成爲對這樣之文化發動「革命」的「反叛者」。無疑的，只有這樣，中產階級才得以維持住做爲具反思性質之「歷史主體」的地位。情形會是如何，就留給歷史來見證吧！

作者簡介

葉啓政，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學習興趣是社會理論，特別是關於知識份子與文化現象。目前正規劃撰寫一本代表個人想法的理論性書籍。

參考書目

- 葉啓政，1985，〈文化優勢的擴散與「中心—邊陲」的對偶關係〉。
《中國社會學刊》9:1-24。
- 葉啓政，1999，〈啓蒙人文精神的歷史命運：從生產到消費〉。《社會
理論學報》2(2):313-346。
- 葉啓政，2000，《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台北：三民。
- 葉啓政，2001，〈均值人與離散人的觀念巴貝塔：統計社會的兩個概念
基石〉。《台灣社會學》1:1-63。
- Baudrillard, Jean 著、林志明譯，1997，《物體系》。台北：時報文化。
- Bauman, Zygmunt 著、楚東平譯，1992，《自由》。台北：桂冠。
- Baumer, Franklin L. 著、李日章譯，1988，《西方近代思想史》。台北：
聯經。
- Cassirer, Ernst 著、顧偉銘譯，1996，《啓蒙哲學》。濟南：山東人民出
版社。
- Fukuyama, Frank 著、李永熾譯，1993，《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台
北：時報文化。
- Hobsbawm, Eric J. 著、王章輝等譯，1997，《革命的年代：1789-
1848》。台北：麥田。
- Pernoud, R. 著、康新文等譯，1991a，《法國資產階級史：從發端到近
代》（上冊）。上海：藝文出版社。
- Pernoud, R. 著、康新文等譯，1991b，《法國資產階級史：近代》（下
冊）。上海：藝文出版社。
- Pernoud, R. 著、黃景星譯，1991c，《資產階級》。台北：遠流。

- Sombart, Werner 著、王燕平、侯小河譯，2000，《奢侈與資本主義》。
上海：人民出版社。
- Agnew, Jean-Cristophe, 1993, "Coming Up for Air: Consumer Cult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19-39, in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edited by J. Brewer and R. Porter. London: Routledge.
- Appleby, Joyce, 1976, "Ideology and Theory: The Tens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1: 499-515.
- Appleby, Joyce, 1978,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ppleby, Joyce, 1993, "Consumption in Early Modern Social Thought." Pp. 162-173, in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 edited by J. Brewer & R. Porter. London: Routledge.
- Bataille, Georges, 1988,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ume 1: Consump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NY: Zone Books.
- Baudrillard, Jean, 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St. Louis, Missouri: Telos Press.
- Baudrillard, Jean,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Missouri: Telos Press.
-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lated by Iain H. Grant. London: Sage.
- Bauman, Zygmunt, 1998,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Buckingham,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Y: Basic Books.
- Bell, Daniel,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Y: Basic

Books.

- Bell, Daniel, 1979, "The New Class: A Muddled Concept." Pp.169-190, in *The New Class?* edited by B. Bruce-Briggs. Boston: West Bend.
- Bellah, Robert N.,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M. Tipton, 1985,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njamin, Walter, 1969,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Pp. 217-252, in *Illumination*,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NY: Schocken Books.
- Bourdieu, Pierre,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98,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 Braudel, Fernand, 1982,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ume II: The Wheels of Commerce*, translated by Sian Reynolds. London: Collins.
- Bruce-Briggs, B. (ed.), 1979, *The New Class?* Boston: West Bend.
- Burrows, R. & C. Marsh, 1992, "Consumption, Class an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Pp.1-14, in *Consumption and Class: Division and Change*, edited by R. Burrows and C. Marsh. London: Macmillan.
- Campbell, Colin, 1987,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Campbell, Colin, 1993,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Patterns of Consump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 Character-Action Approach." Pp.40-57, in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edited by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London: Routledge.
- Campbell, Colin, 1995,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Pp.96-126, in *Acknowledging Consumption: A Review of New Studies*, edited by D. Miller. London: Routledge.
- Desrosieres, Alian, 1998, *The Politics of Large Numbers: A History of Statistical Reason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ijlas, Milovan, 1967, *The New Class*. NY: Praeger.
- Engels, Friedrich, 1960, *Dialectics of Nature*, edited by C. Dutt. N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Ewen, Stuart & Elizabeth Ewen, 1992, *Channels of Desire: Mass Images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onsciousness*.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Eyerman, Ron, L. G. Sevansson & T. Soderquist (eds.), 1987, *Intellectuals, Universities, and the State in Western Modern Societi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eatherstone, Mike, 1991,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 Fine, Ben & Ellen Leopold, 1993, *The World of Consumption*. London: Routledge.
- Firat, A. Fuat & Nikhilesh Dholakia, 1998, *Consuming People: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Theaters of Consumption*. London: Routledge.
- Gigerenzer, Gerd et al., 1989, *The Empire of Chance: How Probability*

Changed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uldner, Alvin W.,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tsia and the Rise of New Class.* London: Macmillan.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Habermas, Jü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197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Y: The Seabury Press.

Kellner, Hansfried & Frank W. Hauberg (eds.), 1992, *Hidden Technocrats.* New Brunswick: Th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Koselleck, Reinhart, 1988, *Critique and 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Lévi-Strauss, Claude, 1963,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Y: Basic Books.

Lukacs, Geor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d in Marxist Dialec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Macpherson, C. B., 1962,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x, Karl, 1964,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edited by P. J. Struik. N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977,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David McLel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strovic, Stiepan G., 1997, *Postemotional Society.* London: Sage.

- Mckendrick, Neil,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1982,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Perkin, H., 1996, *The Third Revolution: 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Moder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Plamenatz, Paul, 1975, *Karl Marx's Philosophy of M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Porter, Theodore M., 1995,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reteceille, Edmond & Jean-Pierre Terrail, 1985, *Capitalism, Consumption and Need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Saunders, Peter, 1986,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second edition) NY: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 Savage, Mike, James Barlow, Peter Dickens and Tony Fielding, 1992, *Property, Bureaucracy an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Seidman, Steven, 1983, *Liber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later, Don, 1997, *Consumer Culture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mith, Adam, 1937,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Y: The Modern Library.
- Veblen, Thorstein, 1912,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London: Macmillan.
- Warde, A., 1990,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Sociology* 24: 1-4.

- Warde, A., 1992, "Not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p.15-31, in *Consumption and Class: Division and Change*, edited by R. Burrows and C. Marsh. London: Macmillan.
- Weatherill, Lorna, 1993, "The Meaning of Consumer Behaviour in Lat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Pp.206-227, in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edited by John Brewer & Roy Porter. London: Routledge.
-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Williams, Raymond,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Chatto & Windus.
- Wright, Eric O., 1987, *Classes*. London: Verso.
- Xenos, Nicholas, 1989, *Scarcity and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From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duction to Cultural Economy of Consumption: A Perspective by Taking “Class” as An Agency Mechanism

Chi-Jeng Ye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duction has long been taken by Western sociologists as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ual foundation to illuminate the nature of society, particularly the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Ye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uch a conceptual scheme has gradually lost its feasibility in explaining the so-called postmodern society. Instead,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onsumption will offer a greater power of explanation giving both clearer meaning and cleare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Under the rubric of “class” as a sensitive construct to serve as an agency mechanism, the concept of “comfort” developed in the 17th-century European society can be elaborated as the key notion in sharpening the concept of bourgeois, particularly that of the “middle class” developed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so-called “new class”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Accordingly, the new class is embedded with a structural position, namely, contradictory location in a contradictory class relationship (CLCR), which eventually jeopardizes the power of explana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urther the concept of new class jeopardizes the not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refore,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may serve as Marxists used to believe and claim.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what the nature of CLCR induces instead is to promote the notion of symbolic consumption to an unprecedented position in enlightening the description of modern society. As a result, the tension of a life-and-death between different classes which used to be found in the domain of production, has been diminished. What consumption brings up is mainly a state of eternal life in which freedom is conveyed through a tangible opportunity that people can easily consume a symbolic world without limitation as long as a basic requirement (such as having enough money) is met.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duction, cultural economy of consumption, new class, contradictory location in the contradictory class relationship, comfort